
二十年（1998-2017）来中国廉政理论研究现状与展望

——基于 4239 篇 CSSCI 期刊论文的文献分析

彭文龙¹ 吕雄²

（南昌大学 廉政研究中心¹ 公共管理学院² 江西 南昌 330031）

摘要：二十年来我国廉政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数量上表现为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快速增长，在知识脉络上表现为以经济学知识为基础、政治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与创新，在内容上表现为聚焦反腐败的核心主题，围绕公权力和制度建设展开治理对策研究。展望未来，我国廉政理论研究应从公共管理学科定位为基点，立足全面从严治党，聚焦廉洁和反腐败两个核心议题，突破西方理论框架的约束，研究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不同层级政府的实施方案，全面推进廉洁政府建设。

关键词：廉政理论；反腐败；研究现状；文献分析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17 年青年基金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研究》（项目批准号：17YJC710064）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彭文龙（1982-），男，山东枣庄人，博士，副教授，南昌大学廉政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党建与廉政建设；吕雄（1996-），男，云南曲靖人，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主要研究数据挖掘与廉政建设。

联系方式：彭文龙，13970034722, 46448326@qq.com

联系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学府大道 999 号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廉政理论的研究呈现出越发繁荣的趋势,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涉及面广、观点纷呈,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知识梳理,无论对于我国廉政理论研究的知识脉络建构,还是对于寻找廉政理论研究的新方向,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时代的历史当口,全面从严治党对廉政理论研究和反腐倡廉建设实践提出了新的历史需求,也更加迫切地需要对以往的丰硕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在这方面,倪星、陈兆仓(2011)对1980-2009年与腐败相关的514篇论文和文章进行了计量性评估分析,考查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张增田、杨惠(2011)通过对1992-2011年1701篇CNKI核心期刊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研究了国内腐败与反腐败研究的热点主题及演进趋势;李燕凌等(2011)从腐败本质问题界定、腐败行为特征及其成因、腐败测度、反腐败策略四个方面,对我国反腐败问题进行了文献综述;李秀峰、李俊(2004)以国内行政学期刊上发表的148篇论文进行了分类统计和量化分析,对行政学界关于腐败现状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与综述;肖汉字、公婷(2016)基于2009-2013年526篇SSCI国际文献的综述,研究了腐败的定义和测量、腐败与经济发展、腐败与社会公平、腐败与政治制度,以及反腐败的成效。本文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时间跨度设定为1998-2017年,在研究对象上选取4239篇高质量的CSSCI期刊论文,在数据库构建上采取设定时间跨度内的全部样本建立数据库,在研究方法上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分析软件和NVIVO质化分析软件两个国内外较为流行的科学分析软件,对我国二十年来廉政理论研究成果进行计量分析和质化分析,呈现我国廉政理论研究高质量成果的整体概况,揭示近二十年来我国廉政理论研究的演进路径、知识脉络和核心观点,并通过一些讨论对我国廉政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建议。

一、数据收集与研究方法

本文文献数据来源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以“来源文献”为搜索导航,为使数据尽可能全面且便于后期分析,考虑对称性与可比性,在至多三项检索栏中选择两项,检索算法为“廉”或“腐”且均为关键词模糊检索,发文年代为1998-2017年,文献类型为“论文”,检索日期为2018年1月16日,共检索出含“廉”或“腐”论文4946篇,剔除含“廉租房、威廉斯、植物腐烂、豆腐”等无关论文,共有有效论文4239篇。将所有有效文献导出,每条文献记录包括标题、作者、机构、期刊、参考文献等信息,从而建立起文献数据库。研究方法主要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作者与机构合作网络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文献共被引分析,以呈现廉政理论研究知识图谱,展现廉政理论研究前沿与热点。CiteSpace是应用java语言开发的一款信息可视化软件,它主要基于共引分析理论(cociation)和寻径网络算法(pathFinder)等,对特定领域文献(集合)进行计量,以探寻出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其知识拐点,并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谱的绘制来形成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前沿的探测[1]。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在数据库中提取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论文文本,导入NVIVO软件中进行质化分析。

二、文献数据库基本特征分布

(一)发文量时间分布

Citespace统计表明,这20年间的4239篇论文来自26个学科,发表于50个不同期刊,由203个机构251位作者撰写。为进一步分析,从中国知网(CNKI)中同样以检索算法“廉”或含“腐”且均为关键词进行模糊检索,检索导航为“期刊”,发文时间为1998-2017年,来源类别为“全部期刊”,文献分类选择“哲学

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I 类、社会科学 II 类、经济与管理科学”四类，从中检索并筛选出廉政理论研究的全部论文总量，作为比较研究的参照数据库。将其与 CSSCI 期刊发文量制作同现时间序列分布图（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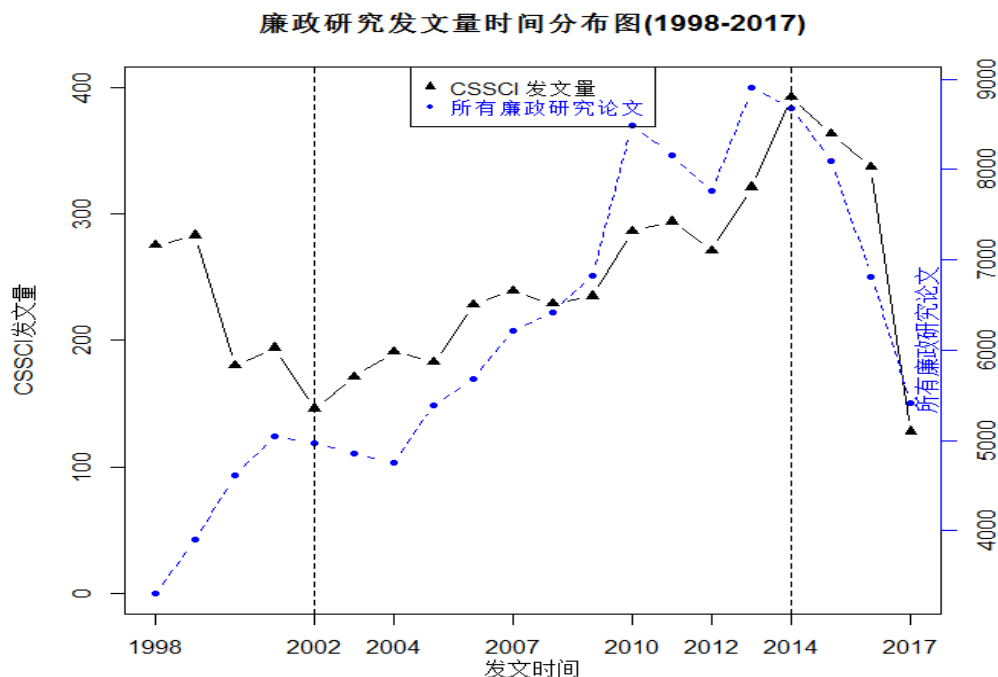


图 1：廉政理论研究发文量时间分布图

从图 1 来看，二十年来，CSSCI 期刊发文量虽有波动，但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 2012 年之后增幅明显，呈现爆发式增长，2014 年 CSSCI 数达到二十年来的峰值 392 篇、占比 4.51%，年均增长约 40 篇，年均增长率约 13.09%，但之后开始趋于下降；这说明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开展，有力推动了廉政理论研究的高速发展。而且每一次党代会（1997、2002、2007、2012）召开以后，都会带来一次廉政理论研究的新发展，到下一次党代会召开前后则呈现下降趋势，较为明显地呈现出了五年一个周期的增减规律。从 CSSCI 期刊发文量和所有廉政研究论文的总量比较来看，1998-2002 年期间 CSSCI 期刊发文量有所下降，从 1998 年的 275 篇回落到 2002 年的 146 篇，但所有廉政研究论文总量却呈增长趋势，由 1998 年的 3307 篇增长到 2002 年的 4974 篇，这表明此阶段廉政研究虽持续为热点，但廉政研究成果不够成熟、质量不高。2002-2005 年期间，总量在降低，2004 年总量降到二十年来的最低点，但 CSSCI 期刊发文量却呈现上升趋势。2005 年以后两者变化趋势基本相同。这说明，1998-2002 年期间是二十年来廉政理论研究的蓄积时期，正是这一阶段的理论传播和积累，奠定了以后研究成果总量和高质量成果的基础，从而实现了高质量研究与总量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共同发展。从上述时间序列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廉政理论研究在经过了理论积累后，目前已经逐步走向成熟；并在研究中表现为较强的时代性。而当前正处于廉政理论研究的重要转折点，一方面廉政理论研究在原有成果积累和消化的基础上需要再次实现理论的新突破；另一方面，十九大以后，党中央在全面推进从严治党、深入开展反腐倡廉中的新阐述、新举措，也会带来理论研究的新发展。

（二）学科分布

表 1：学科分布		
学科	论文数	所占百分比
政治学、管理学	2147	50.67%
经济学	441	10.39%
法学	383	9.04%
历史学、文学	380	8.96%
社会学、教育学	224	5.28%
哲学	115	2.71%
其他(新闻学与传播学、 环境科学、军事学、心 理学等)	434	10.25%

从 26 个学科中合并同质性较高的学科后提取出前六学科，4239 篇论文的学科分布如表 1，其中政治学与管理学论文数量较多，占比高达 50.67%，这说明政治学和管理学是最关注的廉政理论研究的两个学科，这与廉政理论研究的研究对象密切相关，充分说明政治学和管理学两个学科是廉政理论研究最重要的学科基础。其次，是经济学、法学、历史学与文学等学科，占比 28.39%，反映出经济学、法学、历史学与文学等是廉政理论研究的重要维度，对廉政理论研究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最后，社会学与教育学、哲学，以及其他学科都对廉政理论研究有所关注，表现出了廉政理论研究多学科交叉的特征。

三、高产机构和核心作者合作分析

将 4239 篇 CSSCI 论文导入 citespace 软件中，参数设置：时间跨度 1998-2017 年，Years Per Slice 设置为 1 年，Node Types 选择 Author 和 Institution，Selection Criteria 设置为 10%，即只提取每年发文量排名前 10%的机构和作者，呈现在核心作者和高产机构的合作图谱中；考虑数据量过大，Pruning 选择 MST 进行剪枝。运行程序后最终形成节点数为 454，连线数为 176，网络密度为 0.0017 的合作图谱。采用对数似然率 LLR 算法聚类后，局部放大结果如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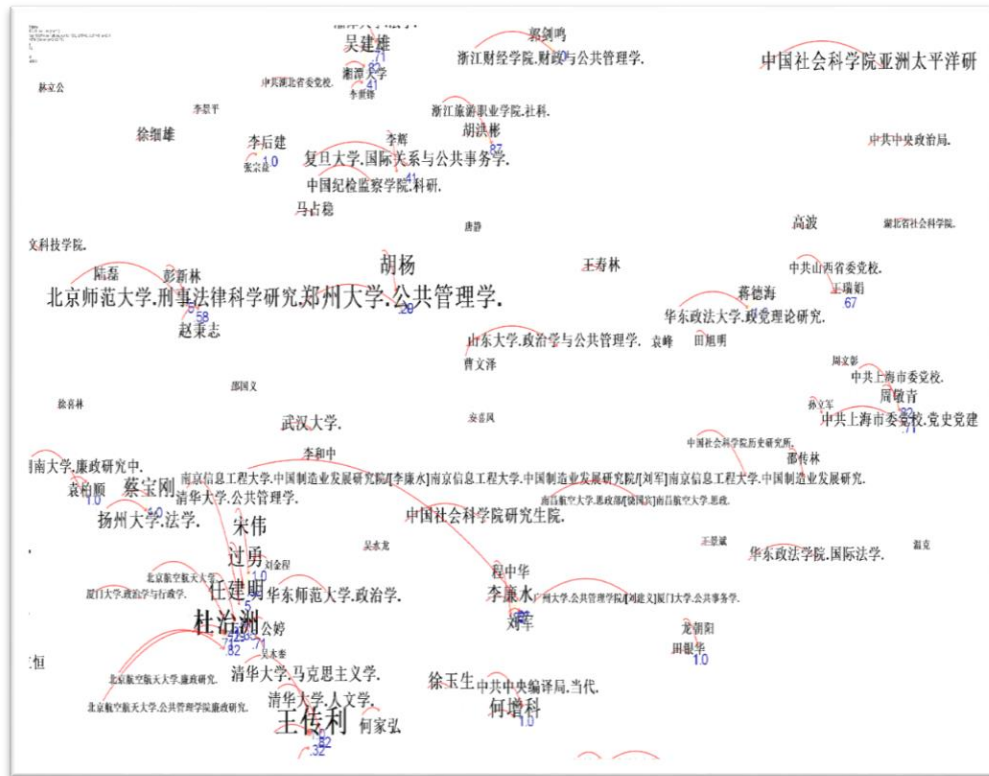


图 2：高产机构与核心作者合作图谱

合作图谱中作者之间的连线表示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作者与机构之间的连线表示作者属于对应机构或作者与该机构的某位学者进行了合作，连线颜色表示首次合作时间（由蓝色-红色，浅色-深色，表示时间由远及近），连线粗细与合作次数成正比。从图 2 中可以看出核心作者或高产机构聚集群体较少或有集群但规模小，多为分散状态。聚类后 $S^{①}=0.4306<0.5$ ，聚类信度低，说明我国廉政理论研究整体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核心团队少，机构间合作不多，凝合度弱。从图中可大致看出五支略微明显的合作团队，一是以杜治洲和任建明学者为中心，与王传利、过勇、宋伟、公婷等学者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厦门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等机构的合作团队；二是以王传利学者为中心，与何家弘学者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育部等机构的合作团队；三是以袁柏顺学者为中心与蔡宝刚学者及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扬州大学法学院等机构的合作团队；四是邵景均学者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合作团队；五是李廉水学者与刘军、程中华学者及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等机构的合作团队。

表 2：首次发文量排名前 10% 的学者或机构 CSSCI 发文量及时间

合作团队及其学者与机构 CSSCI 发文量

团队	学者及发文	时间	合作或所属机构及发文数	时间
----	-------	----	-------------	----

① S 值：即 Silhouette 值，citespace 中用来衡量网络同质性的指标，越接近 1，反应网络的同质性越高，在 0.5 以上时，可以认为聚类结果是合理的。

数							
①杜治洲团队	杜治洲	16	2010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4	2006	
	任建明	10	2006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院	5	2012	
	过勇	9	200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政研究中心	4	2011	
	宋伟	8	201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3	2017	
	公婷	4	2012	厦门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2	1998	
②王传利团队	王传利	23	1998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5	2014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5	1999	
	何家弘	5	2014	教育部	2	2001	
③袁柏顺团队	袁柏顺	4	2012	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	4	2012	
	蔡宝刚	8	2011	扬州大学法学院	6	2011	
④邵景均团队	邵景均	9	2010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6	2000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4	2013	
⑤李廉水团队	李廉水	3	2017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3	2017	
	刘军	5	2017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2	2013	
	程中华	4	2017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	2013	
合作较少的高产机构或学者 CSSCI 发文量（发文量>5）							
学者	发文数	时间	机构及发文数	时间			
倪星	11	2003	求是杂志社	15	1999		
胡杨	9	2009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4	2009		
何增科	8	1998	中共中央党校	9	1999		
李斌雄	7	2011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	8	2009		
徐玉生	6	2014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7	2005		
吴建雄	6	2015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	6	1999		

对首次发文量排名前 10%的学者或机构的发文量及时间进行提取，制作表 2。从表 2 中可看出首次发文量排名前 10%的机构中排名前三的机构依次是求是杂志社 1999 年 15 篇、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09 年 14 篇、中共中央党校 1999 年 9 篇，均较少与其他机构进行合作，且首次成为高产机构的时间早，产量高，都在 9 篇以上，表明这些机构科研结构较为完善，学术制度安排科学，科研力量强，学术潜力大，具有理论开拓创新并丰富深入的特质，是廉政理论研究机构自

我完善借鉴的最好对象。而在廉政理论合作网络中，高校更倾向于团队合作，五支合作团队均以高校为主，党校及研究所更多倾向于独立研究。从学者排名来看，排名前七的学者依次是王传利 1998 年 23 篇、杜治洲 2010 年 16 篇、倪星 2003 年 11 篇、任建明 2006 年 10 篇、过勇 2006 年 9 篇、胡杨 2009 年 9 篇、邵景均 2010 年 9 篇，这些学者多为不同研究团队的核心成员；并且从机构合作时间来看，合作时间大都发生在近 10 年，表明我国廉政理论研究在近 10 年正越来越趋向于团队合作，特别是李廉水团队和所属机构南京工程大学时近年来合作研究的新兴之秀，未来具有较高的发展潜力。

四、研究热点与前沿分析——以关键词为分析对象

关键词是论文核心的高度概括和凝练，能很好反映论文的研究主旨。对 4239 篇论文的关键词进行分析是呈现二十年来我国廉政理论研究发展动向和研究热点的有效方法。

（一）研究热点——基于关键词共现图谱的分析

共现分析的基本原理是对一组词两两统计其在同一组文献中出现的次数，以此测度它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在 citespace 中 Node Types 选择 Keyword，为使关键词图谱信息呈现更全面，Selection Criteria 设置为 20%；为突出重要的结构特征，Pruning 选择寻径（Pathfinder）其余参数同前文所设。运行程序后生成节点数 642，连线数 1414 的共现图谱，如图 3；并提取出频数>60 的高频关键词，如表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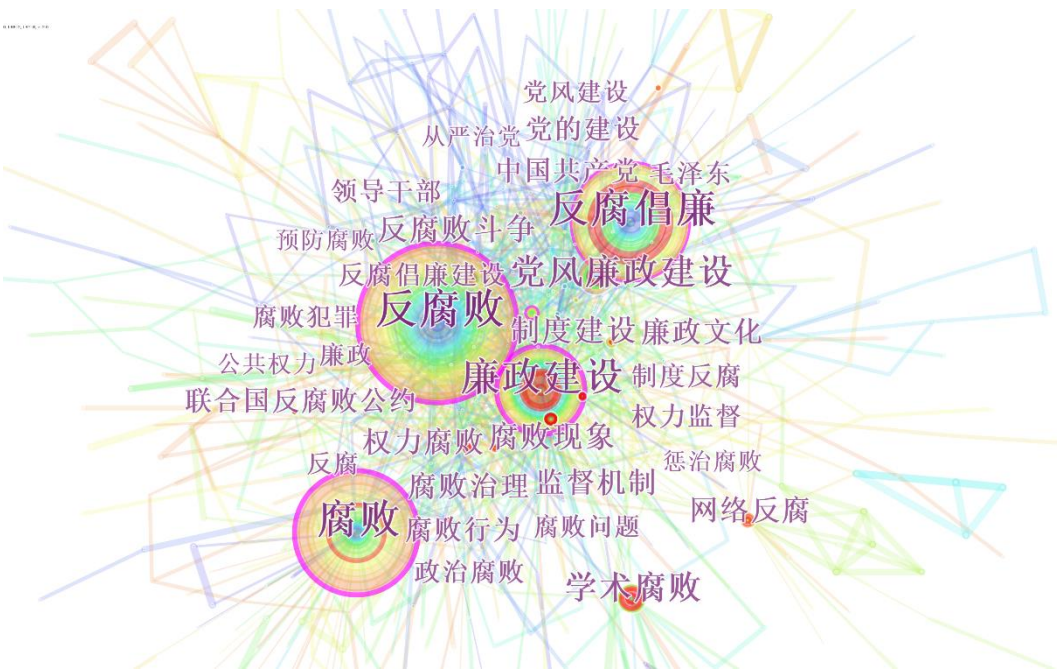


图 3： 关键词共现图谱

表 3： 廉政理论研究高频关键词（词频>60）

关键词	词频	中介中心性 ^①	首现时间	关键词	词频	中介中心性	首现时间
-----	----	--------------------	------	-----	----	-------	------

^① 中介中心性：中介中心性是测度节点在网络中重要性的一个指标，citespace 中使用此指标来发现

反腐败	516	0.28	1998	制度建设	86	0.14	1998
腐败	413	0.33	1998	腐败现象	77	0.06	1998
反腐倡廉	411	0.18	1998	廉政文化	72	0.09	2005
廉政建设	306	0.28	1998	网络反腐	71	0.09	2010
党风廉政建设	174	0.09	1998	权力腐败	64	0.04	1998
学术腐败	119	0.06	2001	监督机制	61	0.07	1998

结合图 3 和表 3 可知，廉政理论研究呈现出“热点集中，首现时间早，持续时间长，主题间联系紧密，时间跨度小”的特征，整体而言研究热点主要以反腐败、反腐倡廉、腐败和廉政建设为中心向外球形辐射，表明我国廉政理论研究主题集中，且长期持续。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形成了以党的建设为载体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趋势且扩展迅速。如图 3 中，关键词“党风廉政建设”、“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从严治党”、“党建工作”等高频出现。廉政理论研究最终服务于廉政建设实践，我国廉政建设本质上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和客体的。廉政建设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自我净化的重要举措，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途径。因此，加强党的建设必然要求不断推进廉政理论研究，这也就表现为前文所述的党代会对廉政理论研究的激发作用。

二是廉政理论研究持续以反腐为核心议题，而反腐败的核心要素是权力与制度（机制）。在关键词共现图谱中，四个核心关键词中有两个（反腐倡廉、反腐败）均直接包含反腐败的词汇。与“腐败”的核心关键词共现频率最高的是腐败行为、权力腐败、政治腐败、反腐、腐败治理等关键词，表明学者们研究主要从行为的角度研究权力腐败和政治腐败，其目的是如何治理这些腐败行为。“反腐败”本身就是“廉政建设”的高频共现关键词，同时还有“腐败现象”、“制度建设”、“制度反腐”、“权力监督”等高频关键词共现，而“廉政文化”的关键词词频仅为 72、中介中心性仅为 0.09，这说明学者们对廉政建设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如何以制度建设规范权力运行以减少腐败，因而，学者们认为反腐是廉政建设的必要条件，而廉政文化是廉政建设的充分条件。同时，以上关键词首先时间主要集中在 1998 年，并且多主要在 1998-2005 期间持续。因此，二十年来廉政理论研究持续以反腐败为研究热点，重点从公共权力和制度建设方面探讨了腐败行为的治理。正因如此，这些研究得到了政治类和管理类 CSSCI 期刊的高度关注，表现为前文所述的学科分布特征。

三是社会上热议程度较高的话题如“网络反腐”、“学术腐败”等则表现出较大的独立性，似乎对这两类议题的研究并未融入到高质量廉政理论研究的主流中，亦或对这两类议题的研究者似乎在廉政理论研究群体中是较为独立的，与主流的研究者之间较少进行学术上的交流；这从另一方面也进一步说明高质量的廉政理论研究大多集中于一般性的政治领域内反腐败的理论研究，而将其研究成果运用于具体的腐败议题如“网络反腐”、“学术腐败”等的程度较低。因而，就表现为“学术腐败”与“网络反腐”虽然是高频词汇，但是却处于图谱边缘，其中介中心性分别为 0.06、0.09，都小于 0.1，并不是廉政理论研究的持续性热点主题。

（二）研究前沿——基于关键词突发的演进分析

研究前沿是正在兴起或突现的理论趋势和新主题的涌现。在 citespace 中，

和衡量文献的重要性，并用紫色圈对该类文献（或关键词、作者以及机构等）进行重点标注，一般认为中介中心性>0.1 的节点在网络中比较重要。

采用 Kleinberg 的突变检测算法来确定研究前沿中的概念，基本原理是统计相关领域论文的标题、摘要、关键词和文献记录的标识符中词汇的频率，根据这些词的词频增长率来确定哪些是研究的前沿词汇。本文在图 3 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突发性^①探测。前文分析述及，廉政理论研究存在“首现时间早，持续时间长”的特征，且时间跨度都在 8 年之内，所以对 Burstness 参数值进行自定义，Minmum Duration 设置为 8，其余参数为默认值，即呈现出最短持续时间为 8 年的关键词，以捕捉廉政理论研究的前沿。运行呈现后生成突发演进图谱，如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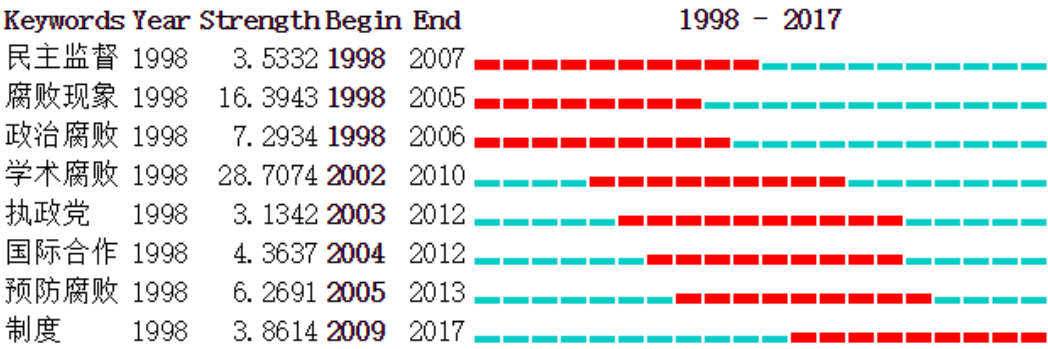


图 4：关键词突发演进图谱 (Minmum Duration=8)

图 4 关键词突发探测得到民主监督、腐败现象、政治腐败、学术腐败、执政党、国际合作、预防腐败、制度等 8 个关键词。根据关键词突发的时间分布，同时考虑前文廉政理论发文数量变化趋势，可以把廉政理论研究前沿大体分为三个演进阶段。第一阶段是 1998-2002 年，可视为二十年来的知识探索阶段，此阶段的高质量论文逐年减少、论文总量在不断攀升，出现的新词汇相对不多，虽然有市场经济、政治体制、领导干部等持续时间较短的关键词，但只有民主监督、腐败现象、政治腐败成为此阶段的主要研究前沿，且持续时间基本一致。第二阶段是 2003-2012 年二十年来廉政理论研究的突破发展阶段，此阶段论文总量虽然在初期下降，但高质量论文数逐年增加，并带动了论文总量的回升和增长。在这一阶段，关键词相对较多，研究前沿集中在学术腐败、执政党、国际合作、预防腐败方面，其中不乏出现公共权力、腐败行为、制度创新、政务公开、党风廉政建设等持续时间较短的关键词；而且，我们还发现，第一阶段的研究前沿不仅未过时而且一直持续至本阶段中期，表明第二阶段正是在第一阶段知识探索和积累的基础上实现突破和发展的。第三阶段是 2013-2017 年廉政理论研究的聚焦和再探索阶段。考虑 2013-2017 年时间跨度不足 8 年，因此对 Minmum Duration 参数由 7 到 1 降序对突发关键词进行遍历探测，发现仅当 Minmum Duration=6 时出现“廉洁”一词时间持续在 2009-2014 年，其余探测均未在 2013 年后探测到突发关键词，因此第三阶段研究前沿仅以“制度”为主，这与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制度治党密切相关，再次证明了我国廉政理论研究与党建实践的密切关联。而且，此阶段论文总量和高质量论文数量分别在 2013 年、2014 年达到顶峰，后逐年速减，表明我国廉政理论研究在聚焦于“制度”研究后，并未形成新的知识增长点，廉政理论研究发展进入到瓶颈期，未来我国廉政理论研究的发展需要进行新的知识探索 and 知识积累，以突破现有知识造成的瓶颈。

^① 所谓突发性，citespace 中指的是在特定时间段内的数据量显著异常于其他时间段，通常通过共现+突发探测一个领域的研究前沿。

五、现有研究的知识基础与核心内容

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看，我国廉政理论研究的相互联系、不断延伸的知识生产系统，这些研究成果的相互引证体现了廉政理论研究的累积性、连续性和继承性，以及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因此，通过引文分析，对这一过程进行追根溯源，可以呈现我国廉政理论研究的知识基础；通过对高共被引文献的质性分析，可以描绘我国廉政理论研究成果的核心内容。

（一）知识基础——被引文献分析

如果两篇文献同时出现在第三篇施引文献的参考文献中，则这两篇文献构成了共被引关系。共被引文献集合组成了知识基础。共被引图谱是 citespace 对一组文献共被引关系的视觉化呈现形式。在 citespace 中参数设置 Node Types 选择 Cited Reference，其余参数如前文所设，生成节点数为 384、连线数为 706、网络密度为 0.0096 的共被引图谱（图 5），同时提取每年内被引次数 ≥ 9 的被引文献，如表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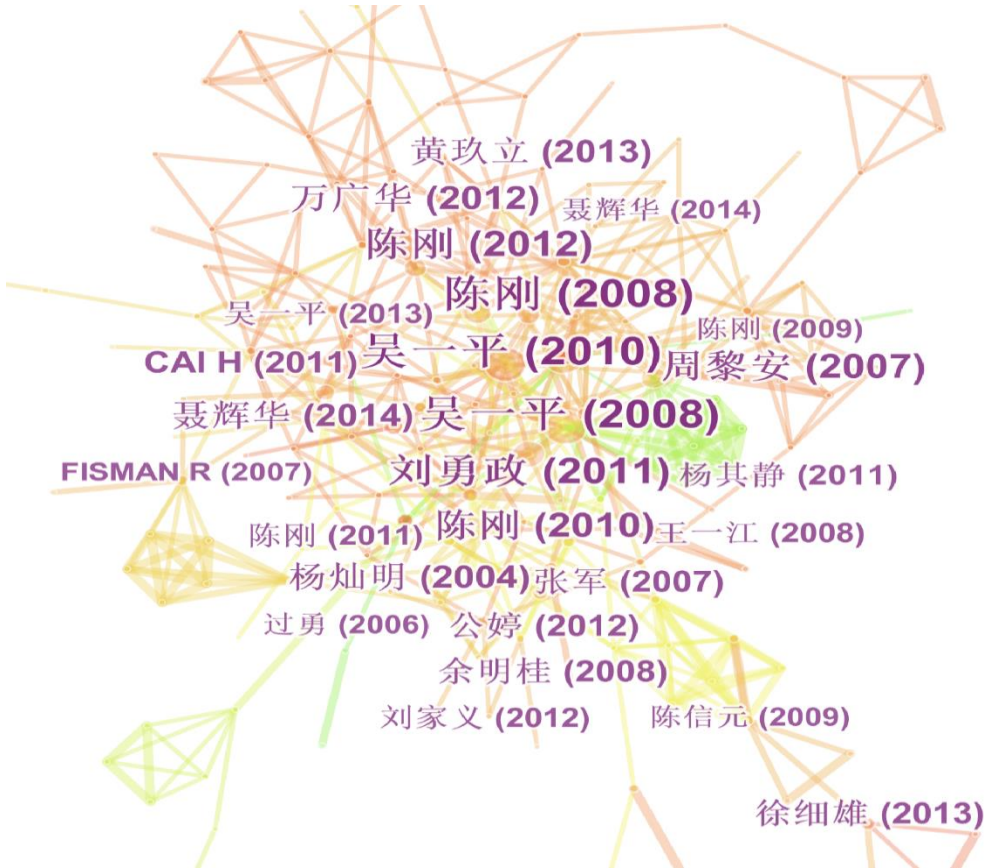


图 5： 廉政理论研究共被引图谱

表 4： 高被引文献表（被引次数 ≥ 9 ）

时间	作者	被引文献	被引次数	来源期刊
2003	谢平	《金融腐败：非规范融资行为的交易特征和体制动因》	9	经济研究
2004	杨灿明	《行政腐败的宏观经济学分析》	11	经济研究

2007	周黎安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15	经济研究
	张军	《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	10	经济研究
2008	吴一平	《财政分权、腐败与治理》	23	经 济 学 (季刊)
	陈刚	《腐败与中国经济增长》	23	经济社会 体制比较
	余明桂	《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	10	管理世界
2010	吴一平	《地区腐败、市场化与中国经济增长》	24	管理世界
	陈刚	《中国的腐败、收入分配和收入差距》	15	经济科学
2011	刘勇政	《腐败、公共支出效率与长期经济增长》	19	经济研究
	杜治洲	《我国网络反腐特点与趋势的实证研究》	9	河南社会 科学
	杨其静	《企业成长:政治关联还是能力建设?》	9	经济研究
2012	陈刚	《官员交流、任期与反腐败》	16	世界经济
	万广华	《制度建设与反腐败成效:基于跨期腐败程度变化的研究》	13	管理世界
	公婷	《我国 2000-2009 年腐败案例研究报告——基于 2800 余个报道案例的分析》	10	社会学研 究
	黄玖立	《吃喝、腐败与企业订单》	12	经济研究
2013	徐细雄	《放权改革、薪酬管制与企业高管腐败》	10	管理世界
2014	聂辉华	《中国地区腐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11	中国软科 学
	赵秉志	《中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若干重大现实问题研究》	10	法学评论

根据图 5 和表 4, 被引次数大于等于 9 次以上的 19 篇文献, 时间跨度在 2003-2014 年, 有 11 篇发表在经济类期刊, 有 4 篇发表在管理类期刊《管理世界》。高被引文献前 5 篇依次为吴一平学者 2010 年的《地区腐败、市场化与中国经济增长》(24 次)、2008 年的《财政分权、腐败与治理》(23 次)、陈刚学者 2008 年的《腐败与中国经济增长》(23 次)、刘勇政学者 2011 年的《腐败、公共支出效率与长期经济增长》(19 次)、陈刚学者 2012 年的《官员交流、任期与反腐败》(16 次), 其中 4 篇发表在经济类期刊, 1 篇虽然发表在《管理世界》中, 但其是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腐败。从学者角度来看, 刘一平学者和陈刚学者在前五篇中各占 2 篇; 且从图 5 可以发现, 共被引文献图谱中形成了以吴一平学者和以陈刚学者为中心的共被引集群, 表明这两位学者从经济学视角的研究成果对廉政理论研究起到了极大的奠基作用。这充分说明政治类和管理类期刊虽然是发表廉政理论研究成果的主要渠道, 但是经济学视角的知识却是构成二十年来廉政理论研究的主要知识基础。同时, 从知识演进路径来看, 这些高被引文献在时间跨度上恰好处在廉政理论研究发文数量的持续增长期, 通过对共被引图谱以 1 年为单位进行时区呈现(图 6), 可以发现, 在 1998-2002 年间一直未形成被广泛认可的基础知识点, 直至 2003 年以谢平学者的《金融腐败: 非规范融资行为的

抽取出短语 5127 组，再进一步基于语义的统计语言模型（LDA）^①实现关键词抽取，设置阈值^②为 0.4，合并重复项共抽取出关键词 1872 个。将抽取出的 1872 个关键词文献链接以保留源链接的方式导入 Nvivo 软件中，反复交叠测试，使一致性系数为 0.75，并进行二次编码后生成矩阵层次图 7，整理后得主题关键词层次结构表 5。

表 5：主题关键词层次结构表

理论层	行为层	廉政建设、 高压惩腐	网络惩腐、举报渠道、国外追赃、腐败案源、惩戒制度、八项规定	
	制度层	监督制约	网络监督	新兴媒体、网民监督
			监督机构	
			多主体监督	政协监督、审计机关监督、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人民法院司法审判监督、人大监督、纪检监察机关监督
			党内监督	预防腐败局、巡视
		公共权力	用权绩效	两个责任、绩效管理
			权力运行	廉洁用权、决策权
			权力配置	简政放权、纪检机构
	精神层	廉洁文化	传统文化、廉荣贪耻舆论氛围、供给能力	
		诚信管理	行为规范	工作作风
			公职人员道德伦理	廉洁自律、纪律意识
			诚信建设	个人有关事项
工具层	影视作品、巡视利剑、刑事修法、网络舆论监督、科技反腐			
部门层	检察机关、环保部、海关、国土资源部、国家审计、法院、财政部门			
领域层	小金库、卫生、社会组织、三资、三农、高校			
地域层				

^① 为使所抽取的关键词尽可能科学合理，此处摒弃 TF-IDF 和 TextRank 算法，采用 LDA 算法。在 LDA 模型，包含词、主题、文档三层结构，该模型认为一篇文档的生成过程是：先挑选若干主题，再为每个主题挑选若干词语，最终这些词语就组成了一篇文章，其中主题对于文章是服从多项分布的，同时单词对于主体也是服从多项分布的。

^② 阈值即控制关键词提取的界线，一般将关键词相对于主体概率小于阈值的概率置为 0。



图 1 主题关键词层次矩阵图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结合 426 篇源文献，可以将廉政理论研究核心内容分为理论层、工具层、部门层、领域层和地域层等五个层面。其中理论层具体可划分为行为层、制度层和精神层三个层次，这是二十年来廉政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工具层面视角更多在科技反腐、网络反腐、组织巡视震慑、文化教育预防、刑事修法防治腐败等方面。部门层面重点关注了国家审计委、检察机关、环保部门、海关、财政部、国土资源部、法院等七部门的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举措。领域层面重点研究了“三资”监管领域、高校领域、社会组织领域、卫生领域、“小金库”治理、“三农”领域六个领域的反腐倡廉建设工作。在地域层则尚未形成有效的核心内容，表明对该层的研究较为零散，关注度较低。

1. 理论层

理论层主要研究了行为、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的内容。在行为方面，核心内

容是依法推进廉政建设、常抓不懈高压惩腐，关键词网络惩腐、举报渠道、国外追赃、腐败案源、惩戒制度、中央八项规定等在 2007 年之后的文献中高频出现。如中央八项规定自出台以来的五年，查处问题数近 18 万，处理人数近 24 万，给予党政纪处分人数近 13 万[1]；境外追逃与境外追赃双管齐下，发挥反腐追逃的整体合力，境外追逃和追赃都是开展国际反腐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密切关联、相辅相成[2]。这些都是取得显著成效的以严惩为主要特征的廉政行为。制度层面的核心内容在于创新监督制约机制和健全公权力规制体制。其中创新监督制约机制主要从监督机构、网络监督、多主体监督、党内监督等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特别是监察体制改革创新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正如马怀德所认为的：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必须破解自我监督这个难题，要以党内监督带动和促进其他监督，健全完善科学管用的权力监督制约体系，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而在公权力规制体制方面，学者们一是聚焦党风廉政建设主业，改革权力配置方式[4]；二是规范权力运行机制，完善廉洁用权体制，防止利益冲突。因为“决策权越大，越有可能发生高管腐败”[5]；三是强化用权绩效问责，提升权力运行效能，特别是“重视绩效管理、严格干部问责”和“强化责任意识、实现权责统一”两项内容在文献中提及较多，存在政策引导效应。在精神层面的研究中，学者们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构建诚信管理体系和推进廉洁文化建设。行为规范、公职人员道德伦理、诚信建设等主题关键词经 Nvivo 分析后被纳入构建诚信管理体系维度，主要关注了通过多种教育形式，强化过程考核监督，以核查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倒逼方式，引导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恪守从政准则和职业规范，增强“四个意识”，强化党风党纪。由 Nvivo 分析“传统文化、廉荣贪耻、供给能力”等主题关键词属于廉洁文化建设的内容，其核心观点是挖掘和传承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中的廉政文化，激发网络新媒体传播正能量，引导形成廉荣贪耻舆论氛围；把廉洁题材纳入文学艺术创作、电影电视剧制作和图书出版计划，打造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相统一的，深受群众喜爱的优秀廉洁文化作品[6]，从而拓宽廉洁文化覆盖面，将提高廉洁文化产品供给能力与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机结合。

2. 工具层

廉政理论研究工具层面主要着眼于科技反腐、网络反腐、组织巡视、反腐倡廉影视作品、刑事修法等五个方面的核心内容。在科技反腐方面，影响力较大的观点是杜治洲学者基于制度预防理论构建科技反腐模型，认为科技手段可以降低腐败动机和减少腐败机会，并提出了科技反腐存在科技发展不平衡、科技反腐可能被泛化和可能忽视制度建设的作用等缺陷，并建议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并进、

加强科技反腐投入的均等化等[7]。在网络反腐方面,较为重要的观点是杜治洲、任建明等学者基于实证的研究,表明网络反腐的重点目标聚焦于中下层官员,而对副部级以上官员的监督更多地依靠权力制约来实现;支撑网络反腐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比网络反腐本身更为重要;网络反腐在未来一定时期内走向衰退。[8]另外,牛先锋学者提出要实现网络反腐有法可依,不断提高网民的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提高治理腐败职能部门的工作效率。[9]在组织巡视方面,赵秉志、彭新林等学者通过对习近平总书记反腐倡廉思想的探讨,强调要用好巡视这把反腐利剑,充分发挥巡视的震慑作用,不断增强巡视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10]在反腐倡廉影视作品方面,较有影响力的是,认为应注重情节至上,类型融合,比较尖锐地触及现实问题,在探讨反腐倡廉方面有超越以往的深度挖掘。[11]在刑事修法方面,赵秉志学者的观点较有代表性,认为贪污受贿犯罪是最主要的腐败犯罪,能否科学、有效地防治贪污受贿犯罪,会直接影响反腐败刑事法治水平的高低和反腐败斗争的成效。[12]

3. 部门层

Nvivo 分析显示,检察机关、环保部、海关、国土资源部、国家审计、法院、财政部门等七个部门在文献中主题关键词出现频率较高,表明这几个部门是廉政建设与反腐败的首责部门或廉政风险重点防控部门。检察机关是腐败案件的主要公诉机关,面对当前腐败数量高、金额大、要案多,以及职务犯罪发案重点领域和环节比较集中、群体化趋势突出等特点,检察机关要试行运用系统办案的方法推进办案工作,发挥侦查一体化机制功能,排除办案阻力,优化执法环境,形成办案工作合力等。[13]以环保部为主体的研究,重点关注实施“1666”工程、行政审批和评审、规范项目资金分配和物资设备采购等方面。海关部门方面多强调以科技创新架构“廉洁国门”。国土资源部方面多集中在紧盯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开展监督、完善土地和矿产资源管理制度并注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14]审计部门承担着预防和发现腐败的重要功能,彭华彰等学者提出通过国家审计的威慑作用预防腐败,通过国家审计的正常开展揭露腐败,通过国家审计的结果运用惩治、抵御腐败,通过国家审计的建议功能完善体制机制,从源头上遏制腐败,通过国家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的良好自律,促进形成廉政文化氛围。[15]法院是腐败案件的主要审理机关,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以司法廉洁教育、审判权与执行权相分离、司法体制改革为核心。财政部门是涉腐的重要部门,余明桂等学者基于实证研究表明财政补贴也可能成为企业寻租的对象,当企业具有政治联系时,这种寻租活动更可能发生。[16]因此,应深化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规范财政部门权力运行,深化财政管理制度改革,从源头上防范腐败风险,并提高

财政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意识。

4. 领域层面

小金库、卫生、社会组织、三资、三农、高校六个主题关键词经 Nvivo 分析后突显,表明这六个领域成为廉政理论研究的焦点,为腐败易发区。罗飞学者认为“小金库”问题在我国国有企业中存在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并且通过收受回扣、管理费用等不入账,非正规罚款,虚列支出,以及处理废旧物质、报废资产不入账等转移资金方式形成“小金库”的途径多种多样。[17]小金库治理应将问题发现机制与问责机制相衔接,保持治理高压和惩处刚性并作为专项治理注重源头设计与持续构建。针对卫生领域腐败,学者们提出的治理措施有:加强医德医风教育,强化行业监管,严格规范诊疗服务和收费行为,规范权力运行,以及构建“权、钱、人、项目”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推行医疗费用支付方式改革等。在社会组织研究方面,施雪华学者认为社会组织为一些腐败分子利用公共权力与私人利益做交易,得到个人或小团体的好处,损害其他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利益提供了方便;也由于公民社会的非自主性、非独立性,无法发挥其监督和制约政府权力被滥用的功能。[18]大量文献涉及了公共资金、资源、资产等“三资”领域腐败高发多发,认为加大“三资”领域制度建设和监管,大力推进改革,防止“三资”实际掌控者消极管理、滥用权力、彻私舞弊,从源头上切断腐败的机会。杨团、孙炳耀两位学者认为我国三农资金由各级政府、政府部门直至村支两委统一派发执行,资金量越大腐败越趋严重。[19]在治理措施方面,学者们提出了整合涉农政策资金项目、规范项目资金管控、考评资金使用绩效、督查“三农”政策落实等措施。高校腐败研究主要以学术腐败为主,政治经济腐败次之。在原因分析方面,认为高校腐败现象隐蔽性较强,重点领域权力寻租问题突出,并且垂直和属地管理并行导致出现管理的“真空地带”,横向科研项目相关管理制度不健全[20]。尹晓敏学者认为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建立预防和惩治并重的反腐败体系,以信息公开开启高校权力监督之门,提升办学透明度等是高校腐败治理之要[21]。

六、一些讨论

二十年来我国廉政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数量上表现为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快速增长,在知识脉络上表现为以经济学知识为基础、政治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与创新,在内容上表现为聚焦反腐败的核心主题,围绕公权力和制度建设展开治理对策研究。然而,其中也有几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是我国廉政理论研究的学科定位问题。根据上文的分析,二十年来我国廉政理论研究的创新发展是建立在经济学视角的基础之上的,而从发文期刊的构成来看,政治学和管理学类期刊是刊发廉政理论研究成果的主要渠道,这实际上构成了我国廉政理论研究的学科定位问题,即我国廉政理论研究根本上应该归属于哪个学科?亦或自成一个学科体系?这一问题对于我国廉政理论研究来说,是最为根本的一个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也决定了未来我国廉政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首先,显然我国廉政理论研究自成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的条件尚未成熟,比如,并未出现高质量的专门的理论期刊学术平台,以反腐败为核心的概念体系事实上逻辑并不完整,因而更多地是作为某一学科下的研究方向而存在。其次,作为一个研究方向的话,究竟是经济学学科下的研究方向,还是政治学学科下的研究方向,亦或是管理学学科下的研究方向?欧文·休斯在《公共管理导论》中指出:经济学理论和私营部门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两个理论基础。[22]以此观点观察,

二十年来我国廉政理论研究恰恰是以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腐败和反腐败的政治议题，并提出政治的和管理解决方案，这也解释了我国廉政理论研究的创新动力来源于经济学知识、而政治学和管理学却是最关注廉政理论研究的两个学科的原因所在。因为，准确地说，我国廉政理论研究是从属于公共管理这一学科的。进一步来看，我国廉政理论研究的经济学视角分析，其秉持的理性经济人的人性假定、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都是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从时间上来看，这二十年也恰恰是公共管理理论在中国发展的黄金时期。因此，就本文对二十年来研究现状的分析而言，我国廉政理论研究应该界定为公共管理学科下的一个研究方向。当前学术界应该从公共管理这一学科定位出发，对我国廉政理论进行研究系统回顾和未来展望，以窥我国廉政理论研究的全貌。

二是反腐败是廉政理论研究的最核心议题么？前文分析表明，我国廉政理论研究最核心的议题是反腐败，在知识脉络上来看，其知识是以反腐败这一核心概念进行逐步推演和展开研究的。从公共管理的价值分析角度来看，反腐败并不具有终极意义，反腐败更多地应作为工具理性存在，至少廉洁的价值意义要高于反腐败的价值意义，因为任何反腐败行为并不以自身为追求，而是以廉洁行为为追求，正是为了实现廉洁，反腐败才有价值和意义。反腐败追求的伦理结果是尽可能的消除与人民的利益和意愿相违背的恶行，但是恶行被抑制并不意味着善行的出现，因此，廉政建设不仅要实现不敢腐、不能腐，更要实现不想腐，廉洁行为的培育应该成为廉政理论研究的核心理论。正如 A. C. Gebe 通过对透明国际话语的分析，指出透明国际过度强调制度建设和加强监督、控制，不应仅仅局限在“控制”腐败行为，而应该将廉洁界定为遵守规则的道德行为。[23]而从前文分析来看，我国廉政理论研究同样也是高度聚焦反腐败这一核心理论，而对廉政文化、廉洁行为培育等廉洁议题的关注度严重不足。在公共管理的学科体系中，廉洁行为培育更多地是作为一种道德行为而被行政伦理学者所关注和研究；在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则被作为一种官德或领导干部道德素质而纳入到政治伦理学者和党建研究者视野中，这实际上表现为我国廉政理论研究在内容上的割裂，即当前廉政理论研究者主要关注反腐败策略，而行政伦理学者、政治伦理学者和党建学者则主要关注廉洁的道德素质和行为。所以，从知识的逻辑体系上看，我国廉政理论研究至少应该将其概念体系建立在廉洁和反腐败两个基础之上，实现这两个基础的融合，并以此推动我国廉政理论研究的瓶颈突破和创新发展。

三是我国廉政理论与西方廉政理论的关系问题。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是从西方引入的，隶属于公共管理学科研究方向的廉政理论研究必然不可避免的涉及本土化与西方理论的关系问题。根据前文分析，我国学者们主要以理性经济人为基本人性假设，对反腐败的制度、公权力、监督制约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种“控制”腐败行为的研究视角明显地带有西方理论的底色。这与肖汉宇、公婷对 SSCI 文献综述的结论是一致的：“西方文献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政治制度是影响国家腐败水平的重要因素。”[24]并且西方学者力图将这一观点推广到发展中国家，如 Anthony Ogus 从西方发达国家腐败治理的规制路径出发，在监管机构和程序上提出了使得规制方法在发展中国家能够发挥作用的策略；[25]Soma Pillay、Ron Kluvers 以民主发展地区为案例证实了制度视角研究腐败及其治理的有效性；[26]公权力无疑是反腐败治理的核心要素之一，而民主制度也是保障公权力合理运行的有效机制之一。但是，在我们学习借鉴西方理论成果时，我们首先明确的基本问题是：西方学者所谓的“民主制度”是什么？这一民主制度是否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现实需要？显然，廉政建设高度

依赖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廉政理论研究也必然首先要明确所处的制度前提，因为“不存在单一有效率的政策选择，只存在对应于每一种可能的既定制度条件下的某种有效率的政策选择”。[27]因此，我国廉政理论研究必须进一步突破西方民主理论框架，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根本，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坚守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从而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论话语和知识体系。

四是我国廉政理论研究的实践导向问题。廉政理论研究“是一个问题导向的领域，因而解决问题、指导实践自然成为腐败与反腐败研究的首要使命”[28]。但是，“目前学界对如何建立有效的反腐败机制仍然了解不多”[29]。虽然如前文所述，二十年来，党代会和党建工作推动了我国廉政理论研究的发展，但是从这些研究成果的核心内容看，学术界主要关注对党和政府廉政建设实践热点的理论阐释，主要表现为理论层的研究成果丰富，而工具层、部门层、领域层相对较少，特别是地域层更是研究不足，因此更多地是从总体上和宏观上提供政策建议，而不是针对特定领域、特定部门以及地方政府提供具体可行的政策建议，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是我国廉政建设任务的具体承担者和效果的直接体现者，更加需要通过廉政理论研究来解决地方政府面临的问题。从二十年来研究前沿和热点、研究基础和核心内容的分析来看，我国廉政理论研究在对党建工作的理论阐释中，其关注点并未呈现出较大的变化，如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些主要议题上述分析中仅在核心内容分析中出现了八项规定、巡视、两个责任等，而以思想建党、制度治党等为代表的重要议题则在关键词共现和核心内容中出现频率不高，表明二十年来我国廉政理论研究虽然以党建实践为导向，但是对党建议题的关注视野仍显狭窄，在将全面从严治党贯彻到廉政理论研究中仍有较大空间。因此，在实践导向方面，我国廉政理论研究以更广阔的视野吸纳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议题，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维贯彻其中，探讨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中，如何将治国理政的发展战略与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全面推进廉洁政府建设，即建构全面建设廉洁政府的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 [1]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八项规定执纪越来越严 违纪增量逐步减少[OL]. 2017年12月6日, http://www.ccdi.gov.cn/toutiao/201712/t20171206_126363.html
- [2]赵秉志. 中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若干重大现实问题研究[J]. 法学评论. 2014(3): 1-17.
- [3]马怀德.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和主要任务[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6(06): 15-21.
- [4]雷玉琼, 曾萌. 制度性腐败成因及其破解——基于制度设计、制度变迁与制度约束[J]. 中国行政管理. 2012(02): 110-113.
- [5]徐细雄, 刘星. 放权改革、薪酬管制与企业高管腐败[J]. 管理世界. 2013(03): 119-132.
- [6]李红权, 张春宇. 大学生廉洁教育: 目标、现状与对策[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1(10): 119-121.
- [7]杜治洲. 科技反腐的理论模型与风险防范[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06): 630-634.
- [8]杜治洲, 任建明. 我国网络反腐特点与趋势的实证研究[J]. 河南社会科

学. 2011(2): 47-52.

[9]牛先锋. 网络反腐的功能及其完善对策[J]. 理论视野. 2009(5): 44-46.

[10]彭新林, 赵秉志. 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研究[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5): 122-133.

[11]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编, 张英伟主编. 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 No. 5[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7.

[12]赵秉志.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问题研究[J]. 中国法学. 2015(1): 25-47.

[13]高铭暄, 陈璐. 当代我国职务犯罪的惩治与预防[J]. 法学杂志. 2011(02): 1-8.

[14]陶坤玉, 张敏, 李力行. 市场化改革与违法: 来自中国土地违法案件的证据[J]. 南开经济研究. 2010(2): 28-43.

[15]彭华彰, 刘晓靖, 黄波. 国家审计推进腐败治理的路径研究[J]. 审计研究. 2013(4): 63-68.

[16]余明桂, 回雅甫, 潘红波. 政治联系、寻租与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有效性[J]. 经济研究. 2010(03): 65-77.

[17]罗飞. 基于“小金库”视角的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研究[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2(07): 20-25.

[18]施雪华. 大力推进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 实现中国反腐败战略的大转移[J]. 社会科学. 2009(07): 3-11.

[19]杨团, 孙炳耀. 公法社团: 中国三农改革的“顶层设计”路径——基于韩国农协的考察[J]. 探索与争鸣. 2012(09): 38-43.

[20]顾昭明, 陈利平. 高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现状与思考[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9(06): 22-26.

[21]尹晓敏. 透明度、权力监督与高校腐败治理[J]. 高等教育研究. 2012(10): 20-24.

[22]欧文·休斯. 公共管理导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77.

[23]Anja C. GEBEL. Human Nature and Morality in the Anti-corruption Discourse of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J].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2, 32:109-128.

[24][29]肖汉字, 公婷. 腐败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基于 2009-2013 年 526 篇 SSCI 文献的综述[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6(2): 48-60

[25]Anthony Ogus. Corruption and Regulatory Structures[J]. LAW & POLICY, 2004, 26(3&4): 329-346.

[26]Soma Pillay, Ron Kluvers.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Perspective on Corruption: The Case of a Developing Democracy[J].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 Management, 2014, 30(1): 95-119.

[27]丹尼尔·W. 布罗姆利. 陈昕, 陈郁, 郭宇峰, 汪春译. 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 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M]. 上海: 格致出版社, 1996: 5.

[28]倪星, 陈兆仓. 问题与方向: 当代中国腐败与反腐败研究文献评估[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1(3): 185-194.